

# 黃帝與黃帝陵

● 柏明 李頌科

● 陝西省地方誌資料叢書

● 陝西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主編





古軒轅黃帝像



## 序

陈元方

作为我中华民族伟大远祖的轩辕黄帝和作为海内外华人祭奠瞻仰之地的黄帝陵，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自古迄今，却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写出具有资料性和科学性的著作布行于世，使得关于黄帝与黄帝陵的历史仍然笼罩在由种种神话和传说编织而成的迷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1986年10月24日，我去榆林途中，夜宿黄陵，在同黄陵县政府办公室和县志办公室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

“我们除了祭奠黄帝而外，还应该研究黄帝。黄帝陵在陕西黄陵县，省志、县志都涉及黄帝、黄帝陵，我们应当编一部《黄帝传》或者黄帝与黄帝陵方面的专著。但它应该是科学的，不是传说的。特别是黄帝其人以及他的事迹，传说纷纭，到底历史的真相如何？国内关于黄帝的传说故事很多，不光我们陕西，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安徽都有不少。对黄帝陵也有不少传说，有的说是实葬地，有的说是衣冠冢，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史记》说：‘黄帝崩，葬桥山’，恐怕司马迁也是根据传说记载的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陕西的史学工作者、方志工作者，有责任给以回答。

“神话传说就是神话传说，不必要求其科学性，但传说故事不是历史。‘志属信史’，我们的地方志写人物，事实必须翔实，

观点必须正确，要具有资料性、科学性，不能搞无稽之谈。但是神话传说，也不是毫无来由，我们研究传说，要剔除其神秘的外衣，采取其合理的内核。

“黄帝是我们民族的老祖先，还有炎帝，我辈芸芸众生，都是炎黄子孙。我们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老祖先老老祖先，但远古时代，没有文字，当然也就没有文字记载。后来有了文字记载，但三代以前的人和事，都是根据传说而记载的。现在我们连老祖宗的氏族、部落、图腾、籍贯、事迹都弄不清，‘数典忘祖’了。”<sup>①</sup>

后来，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西北大学柏明、李颖科同志担负研究与编纂《黄帝与黄帝陵》一书的任务。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和我多次交换意见，商讨写法，我们在观点与方法上是一致的。事隔三年多的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黄帝与黄帝陵》，可以说是我们大家的宿愿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黄帝研究中，最大的困难是资料问题。

历史人物，由近到远说吧，有三类情况：一类是有文字记载的人物，例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对此类人物的研究，虽然立场、观点、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存在，研究起来，自然方便。溯而上之是第二类，即史前人物，例如黄帝、炎帝、尧、舜等，留下来的仅仅是少量的传说资料，后世对于他们虽有若干文字记载，但记载的仍然是传说。再溯而上之是第三类，即连任何传说资料也没有流传下来的早期史前人物。虽然我们对于这些早期的人类祖先可以通过考古发掘而发现并研究他们的实际生产、生活状况，但反映出来的一般都是当时人类群体的事迹，例如西安半坡遗址所反映出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状况。至于其中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也许将

---

<sup>①</sup>见《陕西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6期。

被永远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关于黄帝其人，我以为幸而尚有若干传说资料保存了下来，这是非常宝贵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传说资料。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还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是一个原则的区别。

在历史上，任何传说，一般都是事出有因，而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否则连这些传说也不会流传下来。据此，我以为黄帝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格神式的神话人物。但是，既是传说，就会走样子（失真），会有遗漏，也会有附加，甚至古怪荒诞。但这也无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透过现象，探求其本质；拨开神话传说的迷雾，找出其合理的内核。从而尽可能地恢复、还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当然，这项工作做得如何，取决于我们历史工作者、方志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与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如何了。

自从“人猿相揖别”，人类社会就形成了氏族，组成了部落，产生了图腾崇拜，有了生产活动，开始了“人”的生活，同时也出现了文化（只是水准很低而已），发生了战争，当然也产生了领袖人物。有些人因为资料的不足与传说的怪诞，而怀疑黄帝的存在，说“有无黄帝其人，还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我们对此说法，难以苟同。

在距今5千年左右的黄帝时代，我们的祖先——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已由采集与渔猎经济逐步过渡到以饲养、放牧与种植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以及边远草原地区的畜牧经济，与原始农业的发展相适应，人们开始由漂徙流转而定居下来，而定居与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这个时代，由于人们生产、生活以及战争的需要，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创造与发明。例如服饰的创

制，井的发明，釜甑与灶的创制，杵臼的创制，陶器的创制，房屋的建造，舟车的创制，交换与市场的出现，交换媒介物的出现，原始天文历法的出现，婚嫁制度的改进，弓矢的创制与战阵兵法的讲究，特别是原始文字的创制等等。这些有关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诸多工具器械的创造发明以及政治领域中一些典章制度的确立，风俗习惯的改进，在传说中都记在黄帝的名下，黄帝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人和天才。在《易·系辞传》中，对黄帝这些创造发明的过程，甚至还作了有趣的说明，例如说：“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就是说，黄帝之所以能够发明舟、楫，得“舟楫之利”，是因为得到“涣”卦（☱）“木”（巽）在“水”（坎）上的卦象的启发。其他诸如制作衣裳，“服牛乘马”（驯养动物），发明杵臼、弓矢，修造房屋，创制文字等等，都是受到《易经》某种卦象的启示而产生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许多的发明创造，都是出于从事劳动实践的广大人民，而这些发明创造又都是经过不断总结经验，反复改革实验才完成的。因此，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发明创造者是困难的。

以文字的创制为例，传说黄帝的史官苍颉（一说为黄帝）为文字的创造者。现在陕西白水县还有一个史官村与苍颉庙，传说苍颉就是史官村人。其实文字也是群众创制与约定俗成并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的，并非出自某一人之手。苍颉可能确有其人并与文字的创制有关，但他充其量是一个文字的加工整理者。《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矣，而苍颉独传者一也。”这说法是有道理的。秦代统一文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凡与秦文异者罢之。”可见直到秦以前文字尚不统一，更不要说史前黄帝时代的文字了。文字之不统一，说明文字并不是某个“圣人”一手创制的。

再如，井的发明，最初是于水位高处“掘地及泉”，挖个敞口式的坑，便是井。后来于水位深处，打一斜井，沿斜坡入地，“抱

瓮出汲。”最后才是较深的竖井，以绳、桔槔或辘轳提水。这些各种形式的井的创造发明，无疑也是离不开劳动人民的。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轩辕黄帝作为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领袖的那个历史时期，华夏民族在文明的进程中确是大步地前进了。传说中所反映的一系列有关生产、生活和战争的发明创造出现在黄帝时代，也是可以相信的事实。这说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到了黄帝时代，已形成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发展与大变革的时代，是人类文明迅速发展中的一个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人物的轩辕黄帝，就是华夏民族由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姑且使用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的一位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领袖人物。关天黄帝伟大业绩的神话和传说能够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正说明了先民们对这位伟大领袖人物的推崇和景仰，对这一古代盛世的憧憬和怀念。

对于这些，作者在书中都作了应有的分析和考证。应该说，柏明、李颖科同志在关于黄帝和黄帝陵的研究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首先，作者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的学说，来考察和处理黄帝与黄帝陵的一些神话传说，揭开了其神秘的外衣，驱散了其障眼的迷雾，挖掘出了隐藏在神话传说中的历史真实，从而作到用历史来说明神话，而不是用神话来说明历史。

其次，在处理文献资料时，作者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求实态度，对待每一种观点，每一条史料，既不自盲从，也不主观臆断。在诸说相异，经过考证而无法决疑时，便采取罗列并置的方法予以保留，以俟后贤考订。这无疑是一种实事求是、谨严审慎的态度。

再次，作者运用很多考古发现来印证神话传说与文献记载，从而使黄帝与黄帝陵的研究有所依托而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例如关于黄帝陵的地理位置，现有五种说法（陕西说、河北



说、山东说、河南说、甘肃说)，莫衷一是。本书就对此作了研究与回答。而不像从前那样停留在人云亦云的阶段。

其次，《黄帝与黄帝陵》一书，不步他人后尘，敢于创新。比如，一般认为炎帝即神农氏，而作者详加考证之后，则认为炎帝同神农氏并非一人，而是同一氏族前后不同的两个首领，神农在前，炎帝在后。又如关于黄帝与炎帝之战的炎帝，有人认为就是蚩尤，作者在多方论证后，认为不是蚩尤，而正是被人们尊为“火神”的炎帝。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许多。

根据以上情况，我以为《黄帝与黄帝陵》一书在黄帝与黄帝陵研究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是迄今为止的关于黄帝与黄帝陵研究中，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具有广泛资料性和较强科学性的一部著述。这是令人高兴的。

《黄帝与黄帝陵》的问世，必将增强我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与凝聚力，必将有利于弘扬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必将焕发炎黄子孙们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激情，也必将使海内外关于黄帝与黄帝陵的研究工作走向一个新阶段，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末了，还须一提的是：有的读者对书中的某些观点，可能不会赞同，有的人会以为某些论证还不够有力。所有这些，只能依据各自的慧眼予以鉴识。但学术无止境，真理任争鸣。相信只要大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问题，这些暂时尚不一致的意见，将会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和进一步的探索研究取得共识。前人没有认识的，我们现在认识了；我们现在没有认识的，后人将会认识的。这，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1989年12月于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目 录

序.....	陈元方 ( 1 )
引 言.....	( 1 )
一 黄帝的历史与传说.....	( 9 )
1.1 黄帝其人 .....	( 9 )
I 历史上的黄帝与传说中的黄帝.....	( 9 )
II 黄帝的出生及出生地.....	( 14 )
III 黄帝的生活时代.....	( 18 )
IV 黄帝的妃嫔.....	( 23 )
V 黄帝的子孙及其散布.....	( 25 )
VI 黄帝建都之地.....	( 37 )
1.2 黄帝与中华民族 .....	( 38 )
I 黄帝与炎帝之战.....	( 39 )
II 黄帝与蚩尤之战.....	( 45 )
III 刑天与黄帝之争.....	( 55 )
IV 黄帝的游历与外人朝贡.....	( 56 )
V 黄帝子孙与后世民族.....	( 61 )
1.3 黄帝与中国政治 .....	( 63 )
1.4 黄帝与中国经济 .....	( 71 )
1.5 黄帝与中国文化 .....	( 81 )
二 黄帝陵、庙的建置与沿革.....	( 88 )
2.1 黄帝陵、庙的建置 .....	( 88 )
2.2 历代的维修与保护 .....	( 95 )

2.3 黄帝陵、庙现状 .....	(102)
<b>三 历代的祭祀与祭文</b> .....	(108)
3.1 祭祀盛典 .....	(108)
I 上古到宋元.....	(108)
II 明、清.....	(111)
III 中华民国时期.....	(113)
IV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17)
3.2 古今祭文 .....	(130)
I 明.....	(130)
II 清.....	(133)
III 中华民国.....	(144)
IV 中华人民共和国.....	(151)
3.3 后人赞颂 .....	(169)
<b>四 黄帝传说故事</b> .....	(211)
4.1 黄帝本身的传说故事 .....	(211)
4.2 与桥山有关的传说故事 .....	(218)
4.3 黄帝之臣及其妃嫔发明创造的传说故事 ...	(222)
4.4 其它传说故事 .....	(232)

附： 黄陵县八景

## 引 言

二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写《五帝本纪》时，曾无限感慨地发了一段议论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上述议论道出了司马迁写《黄帝本纪》的难处以及他对古史的认识、对史料的态度和写作方法。

近五千年后，我们撰写《黄帝与黄帝陵》时，关于史料的困难，依然如故。人们常常称述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那是原始社会的事，太遥远了，流传下来的只有神话传说。若按照司马迁的方法，“择其言尤雅者”，写黄帝其人虽可省事，但讲不清黄帝之所以成为黄帝，若反其道而行之，把神话传说当信史去阐述黄帝的作为，则更属荒诞无稽。

我国古代，人们虽然对神话传说产生过种种误解，但也有先哲注意到运用神话传说，去研究“人类历史的童年”，如韩非将

“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时代，称为“上古之世”；将“鲧禹决渚”时代，称作“中古之世”；将“汤、武征伐”时代，称作“近古之世”。<sup>①</sup> 韩非之所以能对古史作出颇具历史进化论的分期，是由于他运用了“趋时更新”的进化史观作指导，比较正确地运用了神话传说的缘故。

远古神话传说是人类历史童年期的创造，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sup>②</sup>。它经历了口耳相传的漫长岁月。在远古时期，确切地说，在文字尚未出现以前，流传于人间的神话传说就是后人研究这一时期客观历史过程能够凭藉的重要资料。因为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人们要表达自己的看法，或彼此交流思想感情，只有依靠语言。不过，由于语言是从口中发出的声音，它既不能达到很远的地方，又不能长期保存下来，出口之后，随即消失。我们的祖先为了解决传播知识上的困难，便借助于自己的记忆，也就是把自己听来的话牢牢记住，然后再对别人重复讲出来。这样一来，人们讲过的话，不仅可以传到远方，而且还能够一代一代传得很久。正因此，远古时代的许多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历史的性质，或者说有其历史的成分。换言之，它们的产生与社会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不是出于人类头脑里的空想。正如高尔基所说：“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要把费尽一切力量去为生存而斗争的两脚动物想象为离开劳动过程，离开氏族和部落的问题而抽象地思想的人，这是极端困难的”。<sup>③</sup>

我国远古时期的许多神话传说，在先秦和汉初史籍中以各种

---

①见《韩非子·五蠹》。

②《〈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③高尔基：《苏联的文学》。

不同形式的记载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尽管这些记载既是零碎的，又在很大程度上经过后人的加工，但它毕竟保存着后人无法虚构的内容，亦即保存着原来历史的真实性，并非完全属于向壁虚构。正如拉法格论述远古神话传说的史学价值时所说：

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sup>①</sup>

黄帝作为远古传说时期的人物，我们研究他，势必要依靠当时的神话传说。很清楚，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既有真实可靠的，也有虚假错谬的。究竟怎样来辨别孰是孰非呢？我们在本书中以人类社会历史的模式来处理这些神话与传说，亦即凭藉我们当今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立足于当时人类社会生活状况来剖析这些神话传说，也就是说用历史来说明神话传说，并用神话传说来研究历史。比如，在有关黄帝战炎帝的传说中有这样一条资料：“黄帝与炎帝战于阪（阪）泉之野，（黄帝）帅熊、罴、狼、豹、貔、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sup>②</sup>我们在处理这一传说资料时，把它解释为：“黄帝率领过去曾以熊、罴、狼、豹、貔、虎等为图腾而现在仍以它们为名号的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鹖、鹰、鸢等鸟的羽毛制作的旗帜英勇杀敌。”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古时期，每个氏族部落都有他们的图腾，而这些图腾都是取自于动物或无生物的名称，比如蛇图腾、龙图腾、凤图腾、云图腾等。在这里，所谓“帅熊……为前驱”，当是那些过去曾经以熊等

---

①拉法格：《宗教和资本》第2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②见《列子·黄帝》。

动物为图腾，现在仍以它们为名号的许多氏族部落的象征，他们也是黄帝之族的组成部分。所谓“雕……为旗帜”，实质上是说这些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等鸟类的羽毛制作的象这些鸟的形状的旗帜。因为在我国古代，人们常常用鸟的羽毛来制作或装饰旗子，如李斯《谏逐客书》中的“建翠凤之旗”，意即树立起用翠羽编成凤鸟形状的旗帜。所以这样解释，既易被今人所接受，同时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综观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与后世文献典籍，在论及黄帝时，有时写作“黄帝”，有时写作“皇帝”。这主要是因为古语中“黄”与“皇”通用。例如，《国语·晋语》中的“苗棼皇”在《左传》宣公十七年和成公十六年作“苗贲皇”，而到《说苑·善说》便作“蚺釜黄”，又如《逸周书·会》中的“吉黄之乘”，《说文》马部作“吉皇之乘”，所以，在古书中，黄帝有时写作皇帝。比如《周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风俗通·声音》说：“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再比如，《吕氏春秋·贵公》曰：“丑不若黄帝。”毕沅校正云：“黄帝刘本（指明刘如龙本）作‘皇帝’，‘皇’‘黄’古通用。”我们在行文的过程中，凡是引文一律遵照原文，而在议论时都写作“黄”，这也是应该说明的一点。

史书之作贵在记实，然而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前人的著作中往往存在着谬戾乖舛和子虚乌有之处，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在中外历史上，那些“指鹿为马”、存心伪造历史的人时有发生，他们或者为讨主子之欢心，或者为求一己之私利，而每每不惜颠倒黑白。另一方面，我国古代文献所用书写的材料，经过由简策而缣帛、由缣帛而为纸的演进阶段；书写的字体也经过由古籀而篆而隶而楷书的发展过程。沧桑变迁，伴随着漫长岁月的辗转流逝，自然免不了因简策的残缺、缣纸的腐烂和字体的嬗变而造成的讹误失真。同时，在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前，书籍皆为

手抄本，而在抄写的过程中，由于一时的疏忽而讹、脱、衍字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以致造成种种混乱。作为史学工作者，只有采用详加考证的求实态度，才能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否则，将会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郭沫若曾经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sup>①</sup>可见，求实的态度何等重要。

我们在写《黄帝与黄帝陵》的过程中，除参阅古代文献外，还注意到新的考古发现、黄帝陵园的现存文物以及《陕西通志》、《续修陕西通志》、《中部县志》、《续修中部县志》，特别是于右任的《黄帝功德纪》、黎锦熙的《黄陵志》等近人有关之作。对于这些编著，都坚持详加考证的求实态度对待每一条史料、每一种观点，既不盲从，也不主观臆断。又如，关于黄帝与炎帝之战的炎帝，有人认为即是蚩尤。<sup>②</sup>其主要依据是《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所说：“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我们认为这一结论难以成立，遂从三个方面予以辩驳：“第一，据《尚书·吕刑》疏云：“九黎之君，号曰尤。”蚩尤既然是居住在古黄河下游，今山东省、江苏省北部一带的九黎族的首领，怎么能够成为居住于西北岐水一带的炎帝氏族的后代呢？第二，无论就蚩尤的相貌还是其生活习性来看，都不能得出蚩尤是炎帝后代的结论。第三，《路史》乃南宋罗泌所作，一来时间甚晚，二来该书多取材纬书及《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等道家依托之

① 《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

② 见蒋观云《中国人种考》、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及近年出版的《炎帝与炎帝陵》等书。



言，不仅驳杂不纯，而且尤多附会。诸如此类的例证在《黄帝与黄帝陵》一书中还有很多，兹不一一罗列。

在详加考证的同时，我们还采用疑以传疑的态度。尽人皆知，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中，同记一事而诸说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史籍浩繁，同一王朝史就达数种或数十种之多，因之，这种情况就显得尤为突出。如众所知，关于上古时期的五帝就有三种说法，春秋时期的五霸亦有三种说法，不独古代如此，今天亦然。如肇端于五十年代的古史分期问题迄今一直聚讼纷纭，七种说法相持不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著述之中遇到这种情况，采取何种态度，将直接影响到自己作品质量的高低。同时这也是衡量一个史学家是否具有谨严审慎的治史态度的重要标尺。《黄帝与黄帝陵》的写作正是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对于那些同记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而疑不能判的记载，均采取“并皆抄内，以备异闻”的手法，以俟后贤详加考订。例如，我们对黄帝建都之地的诸种说法，就采取这种态度。关于黄帝建都之地主要有涿鹿、有熊、陈仓三种说法。三种观点孰是孰非，今天实难确认，只好诸说并存，以俟来哲考订。又如，关于黄帝陵究竟何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五、六种说法：一、陕西说（内含中部、安定两说）；二、甘肃正宁说；三、河北涿鹿说；四、山东寿丘说；五、河南阌乡说；我们根据历史资料、黄陵现状和研究成果进行具体分析。对于陕西中部（即今黄陵县）说，在排比资料的基础上予以重申，提出：“今之黄陵，古之上郡，古之阳周，即今黄陵。”对于陕西安定说，也给予支持，使上述互相矛盾的说法共存，以待进一步求得共识。对于甘肃正宁说，则尊重乾隆时《正宁县志》的说法，桥山在正宁县东七十里，黄帝陵在桥山。对于河北涿鹿说，则确认其有庙无陵。对于山东曲阜说和河南阌乡说，则认为产生时代较晚，乃附会黄帝传说神话之作，不足为